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3年11月25日

# 学问与学品

□王海光

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有明是非、树道德、以知识引导大众价值取向的责任义务，学养修为至关重要。以笔者陋见，大致会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

世人一般以为，学者是具有知识权威的身份象征。实则不然。学者与专家是有所不同的。专家是知识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备的专门知识，就可称为专家。而学者并不以专门知识为能，而是以提高认知世界的学养造诣为本事，体现的是一种以学术为业，探求知识的生活方式。为学追求的是知识本身，还是知识权威的地位，是真假学者的最大区别。

学者的知识能力如何，首先体现在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道，在学，在问。有什么样的学术修为，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动辄一大堆术语名词，言不及义，故弄玄虚，这是还没有破除名相，学力不逮的表现，还没有能力消化成为常识化的问题意识。学者的问题意识，具有始发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意义。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实性问题？能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能不能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是学者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只有长期潜心治学，才能具有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学养高低的表现，也是学品优劣的考量。

当然，有着真实性的问题意识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把问题真正地讲出来是另一回事儿。学者也是社会上的人，会遇到许多不由自主的无奈，有不得不“被”的尴尬，讲真话经常是很难的，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做到不去讲假话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老学者深刻检讨了假话对道德文化的毁害，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可以三分真话，七分废话，但绝不能说假话。“宁可失语，不可妄言”，这是学者起码的道德底线。

第二，有没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边际。

学者以知识为本位，应对知识有敬畏之心，能够准确地估量知识范围，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确定边际的，边际之外再多走一步即是江湖。“学无涯，知有涯”。一个人的毕生学力所及的，只不过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而已。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识边际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会有僭越的妄言，以无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知识理性的为学态度。西哲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话，自称“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先哲这些闪耀着知识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对知识的庄敬自重，也是在表达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学而能知之。学者能够清楚自己知识的边际所在，有诚心正意的治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本分，才能够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要真正认识一位学者的知识学养，固然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不会说些什么。在当前的市场大潮中，敢于在没有研究的领域夸夸其谈，天下事无所不晓，无所不谈，这是媒体英雄的作为，严肃的学者一般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学者对知识具有严谨如仪的态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会有着为学的诚实和为人的率真。真正学有所成的，都会知道知识的分量，都会有一份谦和自守的学术态度，不会有傲睨自若的妄语狂言。能够坦诚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学者的本分，这是敬畏知识的表现，是学问有道的诚实态度。

第三，是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林立，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同时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学者的学问根基，在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具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的，表现为价值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不仅是理论能否彻底，学说能否自洽的逻辑前提，更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性使然。其统一性的时空范围越大，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能够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符合经验常识，具有真正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时空，彰显文明，是学问的大道。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就是夫子之道内在的价值稳定性。几千年的时空变幻，浪淘尽多少时髦学说，而夫子之学至今仍然在给我们温故知新的知识启迪，可不谓圣乎！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会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度量衡的意义。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学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另一方面，即使是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学知识就是浮萍飞絮，很容易演化为趋炎附势的工具，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学品的高低，人品的真伪，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双重人格。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是否具有专业化的知识水准。

对学者的学术价值的认识，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贡献。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正如朱熹所说：“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在知识精英化的文化时代，学界的学术传承有序，知识层次分明，学业标准清晰。

知识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是很难量化的。互联网时代，要拼凑出个“著作等身”的“大师”来，并非难事。而那些整理年谱、注释著作、编选资料、修订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辨伪存真的学术功底，却是做不来也做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扎实的资料书籍，对学术界的贡献，要远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长远得多。当前，虽然坊间新版书籍汗牛充栋，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屈指可数，知识含量的差异更是判若云泥。这是一种既缺乏知识积累，又缺乏知识创新的低水平轮回状态。而要打破这种低水平轮回，就是要实现知识活动的专业化。对此，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专业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分工，完善职业分途，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现在社会紧缺的不是高级职称，而是真正具有专业化的职业水准和职业道德的操守。市场经济如果缺乏专业化的标准和职业的道德规范，就建立不起有序的社会分工体系，会把每个消费者都逼成半个专家。购买房子要成为地产专家，装修房子要成为建材专家，去医院看病要成为医学专家。这使人们疲于奔命于各种交易活动中。学者是社会上专业化知识程度最高的人，应能以自己的学识修养引导社会，为社会分工专业化水准的提高树立身体力行的表率。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者的学问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看不出其学问的渊源路数，其知识的可信度就是大可存疑的。当前学界的问题，就是会乾坤大挪移功夫的聪明人太多，但欠缺真实功夫，难以有真正的创见发明。就学有所本而言，读书为学业根基。学者一般都会有读书札记、学术书评，可以见其读书功夫的深浅。就渊源有自而言，要涉猎某门学问，一般都得做过读书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学科综述一类的入门基础工作，才有得窥门径的可能。具体到每个学科专业，基本功的要求各有不同。如治西学的需要翻译文本，治历史的需要掌握史料，治经济的需要数学工具等等。而要达到“术业有专攻”的程度，要能获得专业领域的话语权，是需要做大量的读书和研究工作的，绝非朝夕之功。功夫不到，学识不达，术业不明，其话语权的分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知识引导社会，是通过学者的专业化知识来实现的。学者的专业化知识背景的厚重与否，决定了其知识话语权的大小多少。学者的虚名大于实学，对社会的误导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为例，虽然社会的关注度很高，坊间每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是车载斗量，但裨贩之作居多，真正有学术分量的屈指可数。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史研究，有一个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蝉蜕过程，寻求历史真相的工作是艰难的。治学者不仅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史料，依据第一手资料做研究工作，还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发掘历史真相，需要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完备的研究方法。比如解读原始文献，需要了解不同版本的文本差异，认识产生这些差异的时代因素；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需要考察其言行的前后矛盾处，分析导致这些矛盾的不同语境；解读档案文本资料，需要参证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读出无字处的文章。在同样的资料条件下，重建历史现场的水平高低，这就是研究者的学力和学养的问题了。对良史的要求是很高的。大致而言，要做过学术综述方面的工作，要有史料学、版本学和史实考证的学术训练，要做过口述史的研究和采访调查，要做过对人物、事件的专题研究，要做过具体个案的微观研究，要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梳理，要做过思想史、概念史方面的工作，要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探讨……进行这些学术工作，并不是说每个方面都要有专精的研究，而是说要培养研究者的历史感知能力，要具有从事研究工作的完备的知识结构。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越全面，专业知识结构越完整，越能有论史的分寸感，越能接近历史真相，复原出的历史场景就越清晰，不会简单地被历史的文过饰非所迷惑，不会轻率地陷入宏大叙事的历史空洞之中，能够形成自己的历史叙述风格。当代史研究如此，其他学科也应是大同小异。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学术评论

# 防止“标签化思维方式”泛滥

□李志昌

在社会生活中，喜欢给人和事贴“标签”，是人们一种常见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近年来，社会上这种现象显得特别突出，流行着各种标签，如“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体制外、新买办”，“高富帅、白富美、矮穷矬”，“蚁族、啃老族、月光族”等等，不计其数。这些“标签”的流行，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同时也助长“标签化思维方式”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标签化思维方式”的特点

“标签化思维方式”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先给一类事物“贴标签”，再用“标签”去判断、看待个体事物。

“贴标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一些人和事物进行划分归类，概括出一些共同特征，用一个简化的名称来指称这些人和事物，这个名称就是一个“标签”。比如，把有学历、年纪轻、无工作、无房子、状况差、挤在一起居住的人归为一类，贴上“蚁族”这个标签。这种情况是“先归类后贴标签”。另一种情况是，在原有某一类人和事物的基础上，把其中某些对象具有的一些特征，扩大到这一类人和事物的所有对象上，贴上一个标签。比如，从职业来看，医生是一类人，其中有少数医生有不良行为，有人就造出“无良医生”这个标签，贴在所有医生身上。“标签”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一个符号，它代表着一组含义，反映着人们对这类人或事物的一种价值评价，如人们看到“富二代”、“官二代”、“体制外”这些标签，自然就会联想到一些相应的含义。

一旦给某类人和事物贴上一个标签，人们对这类人和事物就会形成一种固化的“印象”，当现实中发生同这类人和事物相关的现象时，人们就会把这个标签作为一种标准，来进行分析、判断。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本来有具体原因和情况，如果人们了解到是一个官员的儿子开车撞了一位老农，就会产生“官二代”仗势欺人这样的判断。医院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人们就会想到是“无良医生”所造成的。“标签”往往成为人们评价别人、分析问题的固定思维模式。

标签化思维方式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偏概全”，忽视个体差异，把少数对象的特征推广到全部对象，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好百好、一丑百丑”。第二，看问题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评价人不是因人而异，而是简单地一概而论，按照“标签”把人和事物简单地对号入座，这实际上也是过去那种“戴帽子”“划线站队”的思维方式。第三，用绝对化、极端化的态度和情绪看待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分青红皂白，非此即彼，往往产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情况，从而容易导致极端化的非理性行为。

树立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贴标签”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对事物进行划分归类，便于识别区分不同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有一定的认知价值。但是如果“标签泛滥”，特别是“污名化标签”泛滥，就应引起注意了。“污名化标签”泛滥是一种社会心态信号，反映了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改革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群体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一些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处理好，产生一些不公平现象，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观念、态度上的差异甚至对立，这是“污名化标签”泛滥的社会原因。同时，“污名化标签”泛滥，又会严重扭曲人们的社会认知，助长人们的负面情绪，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态度对立甚至行为对抗，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防止标签化思维方式泛滥，从社会角度看，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社会管理，进一步改善民生，特别要注意协调处理好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要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社会现象，疏导人们的情绪。从思维方式角度来看，看待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要树立理性的思维方式。第一，不要随便贴标签。对人对事进行划分归类，要避免“以偏概全”，不能把少数对象的特征简单推广到全部对象，不能把个别不良现象当作普遍现象。第二，不要用“标签”简单评价人、分析问题。评价人不能忽视个体差异，即使是同一类人，特征也是各不相同的，要因人而异看待人，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同一类问题，其具体原因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对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防止在“标签”引导下，用绝对化、极端化的态度和情绪看待复杂的社会现象，避免不分青红皂白、非此即彼的态度，更不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作者系云南省楚雄州委党校副校长）

思维方法

# 地方政府公共安全风险防范的实践与经验

□晓　闻

2013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于11月16日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地方政府公共安全风险防范的实践与经验”。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手段，是完善政府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创新应急管理是从更基础的层面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点，因此本次论坛的召开对于交流地方应急管理创新经验、促进地方应急管理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洪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我国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应急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已经设立了居安思危的应急管理方针，但我国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应急管理的基础工作和基础能力仍然比较薄弱。这表现在，对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形成机率和预测预报的监督不够深入，一些地方和部门风险防范自救意识不强，等等。这就需要进一步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把应急管理应用到日常管理之中，做到准备在先，确保突发事件一旦发生，能够及时有效处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针对“十二五”规划要求将风险管理贯穿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他提出要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全面推进综合风险管理机构；三是重点强化基层思想管理工作；四是积极推进地方风险管理体系。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分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企业风险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综合治理五大主题模块。来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社会团体的近百位与会代表围绕这五大主题模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科研信息

#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不等于官德教育

□杨　萍

自2011年国务院提出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要求后，公务员职业道德已被列为“十二五”期间各地公务员管理和培训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也都开设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相关课程。但在公务员职业道德课程近两年的培训实践中，却出现了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与官德教育相混淆，甚至将公务员职业道德等同于与官德来进行教学的趋势，这显然与国家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目的和要求不相适应。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在治吏中强调官德的建设，要求做官要“为政以德”。虽然传统官德教育有其积极可取之处，但是官德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务员职业道德之间在形式、手段、内容、目的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官德实际上是一种私德，所谓私，指向的是君王，即服务于一家一姓，是官员作为私仆对君王的道德承诺。统治者提倡官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王权统治，体现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下人的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所推行的公务员职业道德是一种公德，它产生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相比起传统官德来说，我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强调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意识，强调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公职人员受全民委托管理国家事务，其地位只是人民的委托代理人，所有权力的行使都应是“由民做主”，国家和人民通过法律、制度、监督、罚处等方式确保公务员遵守其职业“底线”。

当前，国务院加强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信念坚定、精神追求高尚、职业操守良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国务院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内容也作了相应规定：公务员要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永做人民公仆，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到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之中等。可以看出，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是要把公务员培养成为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服务大众的人民公仆，而非慎独、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因此，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培训中加入一些古代官德的内容作为借鉴是可以的，但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让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变味成“官”德教育。

为防止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变味，党校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应重点开展三个方面内容的教育。

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升公务员的政治忠诚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的首要内容也是要求公务员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显然，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升公务员的政治忠诚度应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的核心所在。围绕这一核心，党校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教学中，应针对当前公务员群体的思想活动特点，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解疑释惑等方式，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公务员的头脑，帮助公务员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起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使之转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道德力量。

二是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教育，提升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所在，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也是我国公务员履行职业职责的精神动力和衡量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在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培训中，应结合当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采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先进模范公务员现身报告等多种形式，让公务员真切地认识到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必须用于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而不能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特权。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源泉所在，从而自觉地服务人民，主动地问计于民，接受人民监督，甘做人民公仆。在帮助公务员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强公务员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能力。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提升公务员依法治国的能力。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具有较强的现代法治意识与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务员区别于中国古代官员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要高度重视公务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让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起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依法履职，不渎职不滥用权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